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

---

## 柏拉图的三部曲

——《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

---

---

[美] 克莱因 (Jacob Klein) 著 成官泯 译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

---

# 柏拉图的三部曲

——《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

---

---

[美] 克莱因 (Jacob Klein) 著 成官泯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 (美) 克莱因(Klein, J.) 著; 成官泯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西学源流)

ISBN 978-7-5617-6839-6

I. 柏… II. ①克…②成… III.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418 号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

By Jacob Klein

Copyright © 197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2-596 号

西学源流

## 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

(美) 克莱因 著

成官泯 译

统 筹 王 海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8.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839-6/B·48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来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去西方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

## 2 柏拉图的三部曲

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利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有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

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

#### 4 柏拉图的三部曲

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大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 年元旦

## 中译本前言

——雅可布·克莱因和他的《柏拉图的三部曲》

雅可布·克莱因(Jacob Klein, 1899—1978), 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柏拉图阐释者。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终生挚友,他可能是复兴施特劳斯所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之一。

克莱因是俄国裔的犹太人,1899年3月3日生于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Liepāja,在德语中叫 Libau),他的名字在拉脱维亚语中就叫 Jēkabs Kleins。他一开始是在利佩茨克(Lipetsk,俄罗斯利佩茨克州首府,位于顿河支流沃罗涅日河畔),接着在布鲁塞尔(1912—1914)接受学校教育,并于1917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实科中学(Friedrichs Realgymnasium),然后在柏林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哲学、物理学和数学。1922年,他在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指导下在马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随后的年月里,他继续在柏林和马堡学习、研究。他的著作《希腊的数学思想与代数学的起源》的第一部分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若不是德国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这本来会让他在1932年10月获得柏林大学的教职。1934—1935年,他任布拉格大学的数学史教授,1935—1937年,他是门德尔松人文科学促进基金会(Moses



Mendelssohn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研究员。1938年,克莱因到了美国,不久就在位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开始执教,一直到他1978年7月16日在此逝世。<sup>①</sup>1949—1958年,他出任该学院院长,在打造学院的经典名著课程(the great books curriculum)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

克莱因生前出版的著作有三部,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著名的《希腊的数学思想与代数学的起源》,<sup>②</sup>其论题,准确地说,是关于希腊数学思想与现代代数学的起源,它冲决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见洞穴,力图以古人的眼光理解古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希腊算学(logistic)与数学(arithmetic)思想与希腊本体论的关联,并探讨希腊数学思想在近代代数科学中的复兴与嬗变,特别是符号代数在16—17世纪的发展,指明了在数的概念上存在的古今巨变,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变化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这是他研究柏拉图的首个产物,施特劳斯说:“在我看来,在思想史的整个领域,至少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该著作无与伦比。”<sup>③</sup>

---

① 参 Various Authors, *Essays in Honor of Jacob Klein*, Annapolis, MD: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76, 第 i 页。

② *Die griechische Logistik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lgebra* in: *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Astronomie und Physik*, Abteilung B: Studien, Band 3, Erstes Heft, Berlin 1934, pp. 18—105 und Zweites Heft, Berlin 1936, pp. 122—235; 英译本: *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 Trans. Eva Bran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8; New York: Dover Press 1992.

③ 施特劳斯和克莱因,“剖白”(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729页;原文:“A Giving of Accounts”, i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d. Kenneth Hart Green, Albany: SUNY, 1997, pp. 457—466.

这并非朋友间的过誉之辞，一些对比研究克莱因与胡塞尔（特别是其《危机》）的二手文献确乎显明，关于现代性的看法，这位后学在视野上超过了他的前辈。<sup>①</sup> 在克莱因生前发表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论文中，有一篇“现象学与科学史”<sup>②</sup>就发表在胡塞尔纪念文集中，这篇文献现在收入其《演讲与论文集》中。第二本书是《柏拉图〈美诺〉疏解》，<sup>③</sup>发表于1965年，前一年，施特劳斯刚刚出版了堪称其诠释学范本的《城邦与人》，克莱因也在自己的书中阐述了细读柏拉图的诠释学原则（第3—31页）。他的疏解是对《美诺》的逐段解读，它把我们现代读者带进到柏拉图对话录的戏剧情景，回答了“美诺是谁”的问题：美诺的无知（amathia）正在于他拥有极好的记忆而拒绝学习，美诺停留在城邦通常的意见里而拒绝追求知识，于是，作为“某种知识”的美德在美诺身上实际上是不可教的。重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性，对理解柏拉图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克莱因的著作堪称典范，在当时实为空谷足音，施特劳斯把这一重要发现归功于克莱因，伽达默尔

- 
- ① 参 Ian Angus, “Jacob Klein’s Revision of Husserl’s *Crisis*: A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cendental History of Reification”, *Philosophy Today*, 2005 Supplement, Vol. 49 Issue 5, 204—211; 以及 Burt C Hopkins, “Crisis, history, an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roject of desedimenting the formalization of meaning: Jacob Klein’s contributio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24: 11, 75—102.
- ② “Phenome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in Memory of Edmund Husserl*, ed. Marvin Farb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 ③ *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则称自己也该分一杯羹。<sup>①</sup> 1966年春季,施特劳斯在讲柏拉图的《美诺》时,就用了克莱因的疏解作教材,没有第二个同时代的作家能在施特劳斯这里享有如此殊荣。克莱因的第三本书就是现在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三部曲》。<sup>②</sup> 1985年,其门人编辑出版了克莱因的《演讲与论文集》,<sup>③</sup>这本文集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多识。他的著述目录,还可见于 Murley 所编的施特劳斯派书目。<sup>④</sup> 若要得到他更详尽的文献,现在便只能寻求圣约翰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的“克莱因文章书信收藏”(the collected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cob Klein)了。

1977年,施特劳斯已经逝世四年,整个施特劳斯学派在学术界还默默无闻,克莱因出版了他的《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在本书一开始,他简洁而优雅地重申了他阐释柏拉图对话录的原则。正如 Lachterman 在他非常精彩的评论文章<sup>⑤</sup>中所说,这些原则所遵循的范式“游离”于英语世界主流的柏拉图研究范式。这两个范式是“对手”,克莱因的

---

① “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迈尔编,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493页;原文:“Gadamer on Strauss: An Interview”, *Interpretation*, Vol. 12/1 (January 1984), pp. 1-13.

②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③ *Jacob Klein: Lectures and Essays*. Ed. Robert B. Williams and Elliott Zuckerman. Annapolis, MD: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85.

④ John A. Murley, *Leo Strauss and His Legacy: A Bibliograph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357-358.

⑤ David R. Lachterman, “Klein, Jacob,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s, and The Statesman”. *Noûs*, Vol. 13, No. 1. (Mar., 1979), pp. 106-112.

研究对后者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可以理解，它实际上是对主流学界的冒犯。根据 Lachterman 的总结，主流的柏拉图学界——或是来自广义的“分析哲学”传统，或是偏重语文学的“发展”研究——有共同的范式：主要关注对话录中适合做形式—技术分析“论证”内容；论题来自当今哲学构造的主题和结论，并据此检验柏拉图的得失；把柏拉图对话录分成早、中、晚期，以一种目的论倾向把柏拉图的思想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即，中期理念论的内在危机迫使柏拉图日益趋近于现代哲学所熟悉的逻辑分析观念。我们可以说，这些套路实质是以现代哲学的观念透视柏拉图，为了“比柏拉图自己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康德），只见柏拉图作品的“哲学”方面，不见其“诗”的方面，于是，这一范式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视柏拉图对话的文学特征，忽视其中的论证在整个戏剧情节中的位置和作用，它剥掉对话中所谓“非本质的空话”（G. Vlastos），直指其论证的核心，像黑格尔明确说的，对话应该被转化成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文。克莱因的范式与此刚好相反，它要求我们的五官与心灵向柏拉图戏剧中的“言语”与“行动”敞开，不要太过匆忙地相信某个角色的台词，把某个人物（哪怕苏格拉底）当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要求我们作为听众参与其中，参与其对话（辩证法）的历程；要求我们重视戏剧中严肃与玩笑的“姊妹”相连（与苏格拉底的特有反讽相关），或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对话是悲剧与喜剧的结合；它要求我们认识到柏拉图对话录像一个“宇宙”，其中的每一要素都具有它特定的意义，而某些细节可能比冗长的言语更加重要；它要求我们在理解柏拉图思想的所谓发展之前，就一篇对话本身，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克莱因

(或者施特劳斯)的发明或首创,我们可以在很多古代作家的洞见、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注释实践中发现其传统,在现代仍然为施莱尔马赫所重申过。为了理解并解释柏拉图,它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到胡塞尔指出的现代哲学诸“自明”概念背后的历史“沉积”,力求回到希腊概念本身的意义上;它要求我们的哲学阐释遵循哲学活动的上升与下降历程,首先不是从既有的哲学理论出发,而是要从海德格尔所谓日常生活的“实际性”出发,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从城邦的意见出发,这一历程是柏拉图对话录无与伦比地展示给我们的,以致“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与阅读柏拉图密不可分。这样的阅读首先正视一个困难:我们很难说柏拉图的哪些文本明确表述了他的思想(正像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之于其思想),相反,柏拉图倒是明明贬低写出来的文字(《斐德若》274c以下),并说关于最高事物的知识不能写出来(《第七封信》341c—e),这样,我们似乎根本没有达到柏拉图真正学说的可靠门径,以致有必要寻求柏拉图“未成文的学说”,或者说,“隐微的”(esoteric)学说。

上述所有要点,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施特劳斯所分享。<sup>①</sup>看来确实可以说,克莱因与施特劳斯同为复兴“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这两位大师的区别在哪里呢?

克莱因看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的大背景下,所以,“什么(或者谁)是哲学家?”的问题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可以说,三部曲也构成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一种哲

---

<sup>①</sup>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 50—62.

学上的辩护。<sup>①</sup> 克莱因认为,理解三部曲的关键是位于中间的《智者》篇,它的主题是“对智者(智慧教师)的寻求”,其核心理论,当然是其中的存在论:对非一存在的存在性,以及种(克莱因把它们等同于理念)的相互交流的论述。只有让非一存在具有某种存在性,才能说明虚假意见与言辞的可能性,从而说明智者的存在;只有让某些种之间可以相互混合、交流,才可能进行清晰的思想与言谈,从而有哲学家。克莱因的阐释,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基于对细节的重视,<sup>②</sup>通过重述对话情节,他让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在对话中反复提及两者“皆”或“偕”,其意在提醒我们:1)存在是动与静两者皆一起,而非两者之外的第三者,根据克莱因,理念数系列的第一个就是“理念数二”;2)非一存在作为“异”,总是异于某物(存在),“异”体现了“未定之二”;3)“同”总是与异成对出现,它所对应的则是“一”。总之,在克莱因看来,《智者》集中展示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理念与数紧密相连,理念与数的两个最高本原是“一”和“未定之二”(正如亚里士多德准确叙述的那样)。根据克莱因的阐释,《智者》在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总是会有哲人与智者,可以说,哲人与智者一起,正是一个未定之二,所以,关于哲人、智者与政治家,柏拉图不需要另外写一篇《哲学家》。克莱因的结论是,正如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两天之中,哲人、智者与政治家这三者仅仅是二。

对克莱因阐发的这种柏拉图的隐微学说或本体论,施特劳

---

① 施特劳后学对此的专门研究,参 Jacob Howland,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ocrates' Philosophic Tria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② 参 Ronna Burger 编,《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肖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 51—52 页。

斯大概也会赞同,尽管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从未见到这样的内容。<sup>①</sup> 在这里面,未定之二尤其让人感兴趣,如同伽达默尔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对柏拉图戏剧特性的重新发现扩展到政治理论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阐发的隐微的本体论贯彻到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中,施特劳斯的主题——不管是“耶路撒冷与雅典”以及相应的古代与现代、哲学与诗歌之争,还是如克莱因所说的上帝与政治——无不体现了未定之二的原则。施特劳斯可能不会赞同克莱因的是,克莱因阐释柏拉图时在核心观念上大大依靠亚里士多德。<sup>②</sup> 也许,依靠亚里士多德还是依靠柏拉图,造成了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差异?

施特劳斯在著述中未曾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政治哲学立场上进行某种对立,倒是常常强调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大概是为了凸显自己在古今之争中所选择的古代立场。关于这两位古代大哲之间的区别,施特劳斯的一位后学倒是有明白的说明: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强调哲人与城邦(政治共同体)之间

---

① 施特劳斯无疑非常熟悉克莱因的柏拉图研究,早在1930年代的艰难岁月里,两人就经常在通信中讨论柏拉图,不时兴奋地报告各自的重大发现,比如关于“理念的交流”、《法律》的奥秘等等,施特劳斯还常常提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通信原文: *Korrespondenz zwischen Jacob Klein und Leo Strauss*, i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örige Schriften — Briefe*. Hrsg. von Heinrich Meier, Stuttgart Weimar 2001, pp. 455—605. 中译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参原文第459、542页以及第528—529、533—534、536、581页,中译本见第89、261页,以及第214—215、219—220、226、307页。施特劳斯后学对三部曲的研究,详见伯纳德特(1960、1963、1984、1992、1993)与罗森(1983、1995)的有关著述,后者完全否定克莱因的“理念数”进路。

② 克莱因把这样做当作一个稳靠的原则,参本书原文第1页以及第5—6页。

的对立。<sup>①</sup>碰巧,施特劳斯也这样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但是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一区别:我过去和现在都比克莱因更看重哲学与城邦(即便是最好城邦)之间的紧张。”<sup>②</sup>

克莱因的著述大都在研究纯哲学或形而上学,这种搞哲学的方法和他的政治哲学立场有什么必然联系?在同一场合,施特劳斯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之后,继续说道,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相信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登峰造极的就是康德关于实践理性即道德理性的优先性教义。施特劳斯最后说:“如果我们把认为德性或道德德性至高无上的观点叫做道德主义,我怀疑,这种道德主义在古代到底是否存在过。”<sup>③</sup>难道,专攻形而上学的克莱因分享康德的道德主义?真的是这样?施特劳斯弟子伯纳德特曾断言:“克莱因把数学和道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sup>④</sup>数学与形而上学,至少在克莱因这里,是紧密相连的。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的诸德性区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与这一区分相应,又把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理智)区分为理论的(沉思的)理智与实践的(筹划的)理智,理论理智的相应对象是不变的或必然的存在,它的真理是科学性知识或智慧,实践理智的对象则是变动不居的政治与道德生活,它的真理是实践性的智慧,还有制作性的技艺。<sup>⑤</sup>亚里士多德认为,追问一切

① 参 Mary P. Nichols,《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双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1—9页。

② 施特劳斯和克莱因,“剖白”,同前,第730页。

③ 同上,第731页。

④ R. Burger 编,《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同前,第113页。

⑤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8章。



存在的本原与目的的哲学,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学说,哲学生活若离开一些道德德性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是,道德德性的最终根据和目的却只能在道德之外即在理论中找到,根本上,道德德性的尊严只有根据这一目的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德性本身终究不是目的,或者按施特劳斯在那一场合的说法,“如果这些德性仅仅被理解为服从于哲学且是为了哲学,这便不再是一种对德性的道德的理解”<sup>①</sup>。实践的一道德的理性低于理论的理性,施特劳斯说,这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的看法。看来,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不必然导致康德式的道德主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与城邦并非绝然对立,理论确实可以为道德—政治实践提供积极的指导,或许,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态度给了他的现代追随者们莫大勇气,使他们敢于尝试在实践理智所思想的领域寻求与理论理智所求一样的“真理”,把按照科学性知识来设计人的政治与道德生活看作哲学的“希望”。康德把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并举,这明显对应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理智与实践理智二分,但是,吊诡的是,康德在道德法则中寻求的普遍必然性,恰恰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智慧,反倒正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理智的真理的特质。康德道德主义的奥义就是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古典鸿沟,用理论来改造实践,他的哲学是现代哲人用酷似数学的纯粹哲学来筹划人的生活实践的伟大系统工程。

克莱因似乎接近康德,施特劳斯则显然亲近尼采。康德把理论与道德结合,尼采则坚定地探求在道德之外的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的秘密,因为,如施特劳斯所说,尼采深谙古典思想。现代哲人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古典派。施特劳斯不同意克莱因把

---

① 施特劳斯和克莱因,“剖白”,同前,第732—733页。